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主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清史稿选译

修订版

译注 黄毅

审阅 章培恒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主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清史稿选译

修订版

译注 黄毅

审阅 章培恒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史稿选译 / 黄毅译注.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5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ISBN 978-7-5506-0386-8

I. ①清…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清代—纪传
体 IV. ①K249.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5883号

书 名 清史稿选译

译 注 者 黄 毅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386-8

定 价 22.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版 出版说明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是2011年的修订版。全书共134册,包括了从中国从先秦至清末两三千年间的著名典籍。每部典籍都选其精粹(《论语》《老子》则全文收录),收录原文,加以简明的注释,力求准确地译为现代汉语,并于每一篇之前写有对该文的提示性说明。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收录种类相对齐全、译注质量较高的一套普及传统文化的今译丛书。

这套丛书,原在1992年—1994年由巴蜀书社分三批出齐,印行过万套;不久,又由台湾的出版机构买去海外版权在台湾及海外发行,可见这套丛书当年在两岸受欢迎的程度。时隔17年,丛书编委会

决定重新修订,改由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所属的凤凰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是由教育部属下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于1985年策划的。古委会组织了全国18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所长任编委会编委,由我们三人任主编,在全国范围内选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承担各书的译注。从1986年—1992年,历时7年完成。当时,编委会制订了严明、可行的体例和细则,译注者按要求完成书稿。每部书稿完成后,都在全国范围内请编委会之外的专门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两位专家初审,合格后再请两位编委参照初审意见审改,然后退还原译注者改正。待原译注者改正后,再由编委会集中常务编委和部分编委、相关专家在一地将每部书稿从头至尾审改。这样的集中审稿会一般都在8—15天,7年中开了12次审改会。审改后,三位主编再集中在一起逐一审定,交付出版社。这一工作程序,使得这套丛书的译注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所以,这套丛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与多人合作的结果。关于这套丛书的编纂始末,我们曾在1992年4月全书交稿后写有一篇文章,这次附在修订版书末,便于读者了解。

这次修订,是交由原译注者自己修改。少数译注者已去世,则书稿一仍其旧。个别译注者已联系不上,也保持原貌。

1992年—1994年出版时,书前有当时古委会主任周林先生写的序。周林先生是这一丛书的发起者。他已于1997年6月去世,至今已14年了。为了尊重历史,也为了纪念他,修订版仍用他的序。

我们三人在1985年—1992年主持这套丛书工作时,年龄大的是从51岁到58岁之间,年龄小的是从44岁到51岁之间,那时尚有精力组织、参与这一工作,今天我们都已年逾古稀。全书修订版出版之际,心情似乎比当年更惴惴不安地期待着读者的评头品足,期待着不要对读者贻误太多。

回想这套丛书,真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这样深厚、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用无穷。应该感谢这套丛书的全体译注者、审阅者、编委和当年的出版者巴蜀书社、今天的出版者凤凰出版社,是他们的学识、辛勤与真诚使得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章培恒 马樟根 安平秋

2011年3月15日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

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1986年5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1987年5月和7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1987年7月6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

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1987年10月于北京

前 言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朝代。作为清朝“正史”的《清史稿》，尽管属于我国列代“正史”里最差的几部之列，但仍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

所谓“正史”，本指纪传体的史书，也即由“本纪”、“列传”等部分所构成的史书，后来曾有一度把编年体史书也列入“正史”，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时，不但把编年体史书从“正史”中剔去，而且规定列入“正史”的史书必须由皇帝选定。于是由乾隆皇帝“钦定”了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十四史”，起于《史记》，终于《明史》。到北京政府时期，又把《新元史》也列为“正

史”，所以又有《二十五史》的名称。但“正史”须由皇帝或政府来选定，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可笑的事；而且，无论是“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都不包括清朝的历史，假如恪守乾隆时期的那个规定，清朝就没有“正史”了，那也实在说不通。所以，撇开乾隆时期的规定，根据“正史”原来的定义而把《清史稿》列为“正史”，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以清朝为记述对象的大规模纪传体史书只有《清史稿》一部。尽管它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参见下文），但要研究清代的历史仍然离不开它。

那么，《清史稿》的缺点是什么呢？这要从清朝的历史作用说起。

清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就沦为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鸦片战争的失败并非偶然。清王朝建立之初，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矛盾本来就尖锐，加以其最高统治集团——满族贵族集团——又对广大的汉族人采取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尤其在其前期，民族压迫更为残酷，这就使社会矛盾愈臻激烈和复杂。面对这样的现实，清朝政府不是力图顺应社会的潮流，推动新的因素的成长、壮

大,而是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清兵入关之初的掠夺和残杀固然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滞迟、倒退作用,就是顺治、康熙等皇帝为安定社会所作的努力,也主要是以传统的理想社会为模式的。所以,清朝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在经济上重农业而轻工商;在思想上主醇正而黜异端;在对外关系上则采取自大和抵御相结合的奇特态势,除天文、历数等少数技术性领域外,对外来文化的抵斥十分强烈。在推行这一切的时候,对思想的统制一直作为极其重要的一环而处于突出的地位。到乾隆皇帝时,更把凶残的镇压——匪夷所思的文字狱——和精心的改造——《四库全书》的编纂以及与此结合的禁书、对古籍的篡改——巧妙地合并使用,收到了相当满意的效果。而其结果,则不仅在当时延缓了社会的进程,而且对以后的中国人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后一点,鲁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现引其在《买〈小学大全〉记》中的有关论述为例:

……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

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指收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书。——引者），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这是说得很透辟的。总之，在清代前期，通过顺治到乾隆这四位皇帝的努力，社会秩序是建立起来了，经济不但从清初的大破坏中复苏了起来，而且较之明末还有所发展，国力似乎也相当强盛；但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则其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实大于明末时期，而人们的思想特点——鲁迅所说的“奴性”——更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在这

样的情况下,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民族悲剧,原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所以,一部好的清朝“正史”,理当对此作出客观的描述,既显示出社会在经过明末清初的大破坏之后的复兴,以及历届清朝政府在这复兴过程中的作用,也显示出清朝统治集团自清初以来的各种负面作用以及社会在这负面作用影响下的走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应提供足够的有关史料,使读者可借以获得应有的认识。

然而,《清史稿》却并未能达到上述要求。这有多种原因。

首先,《清史稿》是由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纂修的。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纂修的有柯劭忞、缪荃孙、张尔田等一百余人。主持者为清代遗老,纂修人中有不少与其观点接近。因此,对于清朝的统治采取歌功颂德、隐恶扬善的态度。许多凶残的事件在《清史稿》中都不见记录。例如清朝入关以后,特别是清兵南下时的屠杀焚掠,乾隆时的文字狱,《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大规模的禁毁、抽毁、篡改书籍等事,都未记述。这不仅仅是纂修时史料不足所可解释的。因为从清朝末年到民

国初年,许多记载清朝统治集团暴行的书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都出版了,在《清史稿》编纂时,这些书都很容易得到。

其次,《清史稿》纂修时,正值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经费不足,工作不时停顿。从1914年开始纂修,到1927年虽大致告一段落,而实在仍是未定稿。编修既出于众手,彼此缺少照应;其后又未进行认真的统一加工,是以体例不一,史事牴牾,繁简失当,援据差讹,译名互歧之处,所在多有。刊行时也颇匆促,没有认真校勘,这就更增加了书中的错误。现引本书选入的《年羹尧传》中一段文字为例:

……五十七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增设打箭炉至里塘驿站,寻请增设四川驻防兵,皆允之。上嘉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

按,从“皆允之”这句话来看,年羹尧所请求的事应不止一件,但就此句的上文来看,他所请求的又明明只有“增设四川驻防兵”一件事。又,此段文字已经说明,“巡抚无督兵责”,那么,在年羹尧获得总督